

中国
古代
十大
散文家
作品选

谢光辉选注

上

花城出版社

谢光辉选注

上

中国古典文学 十大作品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作品选/谢光辉选注.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ISBN 7-5360-3082-7

I. 中… II. 谢… III. 古曲散文—中国—古代—选集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5352 号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作品选

(上、下)

谢光辉 选注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0.125 印张 2 插页 700,000 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082-7

I·2609 (上、下)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国是一个散文非常发达的国度。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散文与诗歌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它的丰富多彩的面貌和丰硕的成就，也可以与诗歌并驾而齐驱。在这方面，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形式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自古以来，散文就是人们最常采用的一种文学手段。不仅是文学家，而且许多政治家、哲学家、史学家、科学家，都是很讲究文章的写作，注重文章的文采的。有不少古代的政治家、哲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

散文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而言的，它包括汉以后的赋和骈体文，也包括那些随笔、杂记之类的小品。实际上，它就是人们泛称的“文”或“文章”。狭义的散文，则是相对骈文而言的。在上古，文无骈散的区别，自六朝文崇尚骈俪，于是有韵及用对偶者谓之骈文，反之则为散文。而作为狭义的散文之名，据我们所知则最早见于宋人的记载。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载：“山谷（黄庭坚）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又同书引周益公云：“四六（指骈文）特构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可见它与骈文是对称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散文，即是指这种狭义的散体单行之文。

散文是自有文字以来最早出现的书面文学形式之一。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推测，我国的文字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晚期。像西安半坡村等地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很可能就是我国最原始的文字形式。而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则已经是成体系和初步定型的文字，其时代可以早到商代社会的中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所谓甲骨卜辞，是商代王室进行占卜时，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简短记录。这些卜辞少则几个字，多则百余字，记录了当时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它们虽然很简短，但记录形式上都比较完整，语言表达也非常准确和精练，是我国最早记事文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商、周时代特别是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在此基础上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在西周金文中有许多纪功颂德的文字，可以看作是我国颂赞体文章的渊源。古代经典《周易》中的卦、爻辞，产生的时代也颇早，其中多有商末周初的文字。卦、爻辞的记事文字，虽然也很简短，但比起甲骨卜辞更趋完整，并具有某些生动的描写，有的还用简洁洗练的句子表达了某种生活经验以至哲理，是我国古代散文萌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另一部古代经典《尚书》中，则保存着我国最早的成篇散文。《尚书》是一部古老的历史文献总集，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虞书和夏书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某些传说加以增饰、附会编写而成的，并非是什么虞、夏时代的作品；而比较可信的是商书和周书两部分。商书、周书的文字，大都是由史官执笔记载的官方文告，有誓辞、诏令、诰言、训辞和政事语录等。其中商书中的《盘庚》篇，是商王盘庚为迁都之事晓谕臣民的一篇文告，现在读起来虽然难懂，但却大都是当时的口语。其中已含有一些生动的比喻，如“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等等。这些形象的比喻，有的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里。可见，这种早期的成篇文章，还是很有文学意味的，应当视作为我国散文艺术的一个开端。

我国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代，也是我国古代文化蓬勃发展的阶段。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更，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想领域里也引起了复杂的变化和激烈的斗争，形成了“百家争鸣”和“处士横议”的局面。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散文的勃兴。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论篇，同时也是重要的散文作品。这一时期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这些著作家往往把哲理的思考、史实的记录与许多文艺手段结合起来，在说理、记事时，极注意语言技巧，注意逻辑、修辞，注意谋篇构思，有时还调动许多形象化的手段。这样一来，就使这些著作具有了双重性质，既是史学、思想或政论著作，又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有了较高的文学价值。

在这一时期里，既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一类优秀的历史散文，也产生了《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优秀的诸子散文。

从最早的商周时代的散文，到春秋战国代的历史散文，是一个长足的进展。它们不仅更具有了文学的性质，而且已有了许多具有朴素的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它们在记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都能对某些历史场面作出具体的描写，也很注意人物形象的刻划。不少篇章、情节复杂生动，很有故事性。这些作品的语言也相当生动，对于当时行人辞令、策士言谈的记述，更是无不曲尽其妙，辩丽恣肆，有声有色，令人读后有如目睹亲聆一般。它们已经初步具备了后世传记文学和历史小说的基本特色，不仅对于后世的“古文”

发展有影响，而且对于后世故事性体裁作品，如小说、戏剧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历史散文是通过叙事来说理的，那么诸子散文则主要是直接说理。不过在说理中也有叙事的成分，而且还用了许多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诸子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说理而有文采。最初的诸子散文，大都为简短的语录体（如《论语》），后来才发展为长篇大论的形式。由于诸子百家主张不同，流派不同，性格各异，因此诸子散文也明显地表现不同的风格。如《论语》的简洁凝练、纤徐含蓄，《孟子》的灵活善譬、气势充沛，《墨子》的朴实无华、讲究逻辑，《庄子》的想像丰富、奇气袭人，《荀子》的层次清晰、论断缜密，《韩非子》的锋利森严、说理透辟等，可谓新颖多样，各具特色。而其中，又以庄子的散文文学意味最浓，文学成就最高，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最大。

庄子是战国时代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和学说。他的散文的文学成就，超出同时代的其他散文，具有独特的风格。代表庄子思想及散文风格的《庄子》一书，对后世的哲学、文学影响深远。因其与老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一般合称“老庄”；因其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又把他和屈原并举，称为“庄骚”。

《庄子》是庄周及其门徒、后学的著述总集。传世的《庄子》三十三篇，是魏晋人郭象编定的，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庄子》一书，既反映出庄子的思想，又表现出他的文学成就。他的散文总的特色，就是那种汪洋恣肆、不可捉摸、纵横排宕、光怪陆离和雄伟奇丽的浪漫主义风格。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庄子的文章是最富于想像力的。一个普通的事物，在作者的想像之下，往往生出特殊新奇的意味来。他还凭借奇妙的想像力，虚构和创造出许多具

有浪漫主义精神的艺术形象。在文章中大量采用寓言的形式，是庄子散文写作的一大特点。寓言是从春秋战国时的辞令演化而来的。它们大多是一种借此喻彼，言近旨远，以小识大，以浅见深，托古讽今的小说式的小故事，用以阐明深奥抽象的大道理。先秦的历史散文如《战国策》、《吕氏春秋》等，诸子散文如《孟子》、《韩非子》等都有不少寓言。它们以寓言引人入胜，或驳难对方，或阐发自己的主张。而《庄子》对寓言的运用最多，最精，也最有传奇色彩。《庄子·寓言》中所说的“寓言”、“重言”、“卮言”，实际上都是寓言。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的文章“寓言十九”。庄子的寓言，想像奇特，寓意深切，嬉笑怒骂，机趣横生，不仅有启发性，能引起人的联想和思考，而且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充满了智慧的光芒。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就是靠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表达的，而不是通过直接说理的方式来表露的，最富有文学的意味。

庄子散文，文辞丰富而新奇，语言生动而活泼。其语言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寓庄于谐。在庄子的寓言中，作者生动地运用诙谐、谑弄、嘲讽的语言，奇幻的构思，揭露世间的丑态和愚昧的行为，使读者获得鲜明深刻的印象，发人深思。庄子的文章，意境开阔，气势宏肆，有如浩荡奔腾的长江大河，波澜重叠，变化生姿。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对庄子散文有极高的概括和评价。他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在散文发展史上，汉代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在汉代，政论文是比较发达的一种文体。这是因为汉初社会各种制度尚未完备，政治上的弊端较多，造成的社会问

题不少，同时由于汉初分封诸王，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割据局面，国内政局极不稳定，加上北方匈奴势力强盛，侵扰边疆，国家不宁。面对这种现实情况，有识的政治家们纷纷对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又不断地提出改革政治的意见，于是政论文便应运而生，成为一时的风尚，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汉代的政论文大都是奏疏表策之类的作品。

西汉著名的政论文作家，首推贾谊。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辞赋家。他的政论散文，多散见于《史记》、《汉书》等史书典籍中。现今流传的贾谊《新书》十卷，是后人为他编纂而成的，有些篇章较为散乱和零碎。他的政论文章，笔锋犀利，言辞激切，感情充沛，气势宏伟。他还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和铺陈夸张的手法，具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贾谊的政论文章，数量较多，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视野极广，其中的代表作，当属《过秦论》和《治安策》。

作为完整的单篇论文，贾谊的《过秦论》可以说是现存文献中最早的一篇。文章通过对秦王朝兴亡过程及其原因的具体分析，论述了秦之所以速亡，就在于它以暴力取得天下后，仍继续以暴力治天下，结果不免于一朝败亡，从而总结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道理；通过探讨国家的兴亡之理，以警戒后世，让后世有国者作为借鉴。这篇文章在说理时，援史实以为据，逐层推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行文波澜起伏，文笔淋漓酣畅，可谓滔滔而言，其势不可犯，其理亦无穷。文章熔政论性与文学性于一炉，充分体现了汉初政论文的风格，开创了中国散文史论体裁的先河。

《治安策》是贾谊政论文中的又一力作。《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或《政事疏》，是贾谊数次上疏的汇集。在文中，作者审度当时天下的政治形势，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提

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措施和策略，援古证今，左譬右喻，议论畅达而辞势雄劲，文章洋洋万余言，可谓宏篇巨制。论规模，论气势，在后世文章中可与之相比拟者，大概也只有柳宗元的《封建论》和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而高古雄肆，则似有不逮。难怪前人要称它为“西京文第一”，鲁迅先生也推许其为“西汉鸿文”了。

汉代政论文的特点是，语言朴实，说理透彻，针砭深刻。汉初比较优秀的政论文作家，除贾谊外还有晁错。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兼散文家，《论贵粟疏》是他的代表之作。西汉时期桓宽的《盐铁论》也是一部出色的政论文集。他改造和发展了汉赋对话的形式，生动地描写了汉昭帝时期政府所召集的一次盐铁会议的大辩论。此外，东汉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等，也都是优秀的政论文或哲理性散文。

汉代的史传文，也有着突出的成就。而代表着汉代史传文最高成就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我国的史书，最早是记言体和编年体，而记传体的史书，则是创自司马迁。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性著作。从文学的角度看，《史记》的成就也是相当杰出的。首先，它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他善于抓住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某些细节的描写，来表现历史人物。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很多都栩栩如生，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面貌。其次，他在文章的章法结构和语言运用上也有独到之处。《史记》一书，是我国古代史传文的典范。自从司马迁开创了史传体，我国的历代正史，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体例。一部二十四史，史传文占有其最大篇幅。但由于受后世文、史分途的影响，后

世史书中的传记文，无论从思想性还是文学色彩上看，都远远不如《史记》。如东汉班固的《汉书》，虽然在史学上也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但文学上的价值却不是很高。此外，西汉刘向所写的《说苑》、《新序》和《列女传》等，大多记写一些人物故事，虽未必完整，但已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写其生平事迹，属于史传文以外的传记文。

汉代也是我国各类杂体散文充分得到发展的时代。先秦散文主要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它们或为历史专著，或为学者的思想、学术论著，其中虽然也含包和孕育着各种文章体类，但往往并非独立性文章。而到汉代，特别是到了东汉时代，一些文人便开始往往以善写某类文体著称。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各类文体也已逐渐齐备。如据载，东汉蔡邕以写碑文著称，孔融、曹子建、王粲、阮瑀等，或善书、记，或善表文，或善哀诔。这样一来，就使散文各体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进而在文学史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最后，还需要顺带一提的是汉赋。汉赋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文体，它吸取了楚辞体的某些体制特点，又熔铸以先秦纵横家的某些散文辞采、气势，而以铺张扬厉为其特色。汉赋在汉代曾盛极一时，是西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后世则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为骈赋、律赋、文赋等各种形式。这种文体的出现，对我国散文的发展，影响极大。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骈体文，就是在汉赋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骈体文，又称骈俪文，是在诗歌、辞赋以及民间谣谚所惯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排比、对偶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加工创造而形成的一种新文体。这种文体产生于魏晋，鼎盛于南北朝，而且几经起落，直至清末还余绪犹存。它的主要特点是句式整齐，词语对仗，讲求文采，往往以堆砌词藻

典故为务，形式华丽而内容空虚。这与散文讲究思想内容，追求朴实自然以及在形式上散体单行的做法，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因此，骈体文和赋一样，对散文发展产生的影响多数情况下是负面的。往往赋和骈体文兴盛的时候，散文的创作就相对滞后；相反，散文要发展，则必须首先要克服赋和骈体文对它产生的种种不良影响。像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而又文人辈出的时代，散文的整体创作成就却并不是很大，这不能说是与赋和骈文的盛极一时无关的。

尽管如此，魏晋南北朝却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大的发展变化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价值逐渐重视了，文学的观念也逐渐明确了。从这一时期开始，散文的创作也与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散文的题材有所扩大，过去很少被人注意的山水景色，成了人们竞相描写的新内容。其次，文章中的抒情成分，有了明显的增加。一般来说，魏以前的文章，质胜于文，风格朴实凝重，着重于辨析事理；魏以后的文章，文胜于质或文质相副，风格渐趋清峻通脱，而较重于抒情。学术文章和文艺性文章的区分，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曹操的出现，无疑是这一文风转变的关键。他是一个敢作敢为而充满自信的政治家，重刑名而尚通脱。他的文章，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写得非常随便而且大胆的。如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自叙怀抱，坦率诚恳，对自己思想感情的披露毫不顾忌掩饰。在他的大力倡导和影响下，文坛风气为之一变，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或倾诉友情，或品评文章，或叙述怀抱，语言宛转，感情真挚，鲜明地呈现出这一时期文章抒情的特色。魏晋之交的嵇康、阮籍，愤世疾俗，佯狂避世。他们的文章，揭露社会的丑恶和黑暗，尖锐深刻，也非常富有感情色彩。

东晋王室南渡以后，士大夫崇尚清淡，爱好自然，留连山水。他们的文章，疏爽自然，往往不事修辞而情味隽永，更显出清新通脱的特色。如东晋初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俯仰古今，怅触万端，清而实丽。其所作书帖，亦简净洒脱，为小品中的佳作。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发展了这种文风，但却更加朴实和接近生活。他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

与南朝散文的抒情特色相比，北朝的散文则更多理性的色彩，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文笔也以叙述和描写为主。其中有三部值得特别重视的作品，即酈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水经注》记叙河道的源流及其有关历史古迹、人物故事和风俗习惯等，其中对风景的描写最为出色，文字精美，风格清丽而秀逸，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出色的山水游记。《洛阳伽蓝记》描写了北魏时期洛阳的许多寺庙建筑，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相联系，可以说是一部描写社会现实生活的著作，其文笔于朴实浑厚中富有冷隽辛辣的讽刺意味。《颜氏家训》记叙的则是作者一生的经验和对社会人生的种种看法，文笔朴素，语言平易亲切，真实感人。

第二次的散文高潮出现在唐宋时代。唐宋两代，是我国古代文学全面发展的时期，散文的创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鼎盛的局面，其主要的标志，是古文运动的全面展开和蓬勃发展，而代表唐宋古文运动和散文创作最高成就的，则是号称“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其中，又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的成就最为突出，别称“四大家”；王安石的散文也因其风格特异，于八大家中别具一格。

隋唐以后，天下归于统一，改变了南北朝时纷乱的政治

局面，但六朝的余习一时没有大变。隋代和唐代初期的文风，基本上还是六朝文风的继续，赋和骈文还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连朝廷上应用的公文奏牒，也都出以骈四俚六之体。虽然这时有李谔、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柳冕、元结等人起来反对这种文风，但并未形成气候。直等到了中唐时代，由于安史战乱后藩镇割据，政治愈益腐败，国势衰落，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因此政治改革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要求，文人学者，“多求理道”（白居易语）。韩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提出维护儒家道统，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圣人之道来整顿当时的社会秩序的主张。他所大力提倡的古文，就是宣传这种主张的工具。由于他始终如一的坚持和宣传，更由于他本人和柳宗元等卓有成就的散文创作实践，使得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形成了一个有声有势的文学运动。在韩柳两面大旗之下，聚集了李翱、李翰、张籍、皇甫湜、沈亚之以及刘禹锡、吕温等古文创作的强大阵容。古文从此便成了文学的散文，而骈体文却反只成了应用的公文体式的东西。这和六朝时以骈文为文学性的文体（即所谓的“文”）而以散体为应用性的文体（即所谓的“笔”）的情形，恰恰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对照。

韩愈是儒教信徒，一生宣扬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法先王，尊圣崇贤，维护道统，提倡仁义道德。这些构成了韩愈的复古思想。他以文为贯道之器，提倡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他一方面高举复古主义的大旗，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独创精神，反对模拟抄袭，认为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词必己出”和“唯陈言之务去”。他所提倡的古文，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很强开拓性的新型文学形式。它并非真的

要去恢复那早已成为过去的三代秦汉古文，而是要在对其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去重新创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需要的崭新文体。因此，古文运动一方面对东汉以来儒家本身流于繁琐的“义疏”之学以及其后清谈老庄玄理之风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和抨击；同时也对魏晋以来那种充斥文坛的言之无物、华而不实、文辞绮靡、徒求形式而又禁锢思想的骈文展开了最强劲的冲刺和涤荡。

韩愈的散文，涉及面广，形式多样，而且各体皆精。他的政论文，气势宏大，论证深刻，言词锋利，说理透彻；而布局结构，又极严整，层次段落，各有定处，不容移易。其中，被称为“五原”的五篇论文（《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是最重要的卫道文章。它们从政治、经济、哲学观点，阐明儒家之道，反对佛老的“清静寂灭”，有力地捍卫了儒家的道统与民本思想。《师说》也是一篇有名的论说文，它倡导“不耻相师”，对当时社会上不重视师道的风气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进学解》是《师说》的续编，写出了一个“兀兀以穷年”的为人师者（即作者本人）的勤勉和困厄。而《杂说》四首则可以说是一组古代的“杂文”，几百字的篇幅里，翻腾开合，托物寓意，含义深刻。而其中最有名的是《说马》。

韩愈的传记作品，继承了《史记》描写人物的优良传统，善于选择最具典型的真实事件片断，来刻画人物性格。他的《张中丞传后叙》可以说是叙事文中的一篇杰作。文章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也有生动的人物描写，各种写法穿插点染，融成一体，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特色。它记述了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在睢阳之围中英勇就义的感人事迹，塑造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可以说是一幅色彩鲜明、形象完整的英雄图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而文字的精练，

叙述的生动，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韩愈还是一位写碑志的高手。他的碑志，剪裁有方，刻划细腻，叙述生动，感情色彩浓厚，爱憎分明，而写作手法上也多种多样，能够不断地变化出新，充分体现出它的文学性能。在他碑志的人物长廊中，有着各种各样精心描画出来的、丰富多彩的生动的人物画像。是作者的如椽大笔，把他们一个个都写活了。而韩愈所写的碑志数量，在历代作家中也是最多的。其中，《贞曜先生墓志铭》描写了诗人孟郊的一生，沉痛地写出这位在社会的忽视下度过一生的诗人的遭遇和他身后的萧条。《柳子厚墓志铭》则写的是杰出的文学家柳宗元，对他的立身品节和文学贡献，作了崇高的称颂。墓志中对卖友者的谴责，是任何时代都有现实意义的。

祭文中的代表作是《祭十二郎文》。这是一篇充满真挚感情的哀悼之文。作者于琐屑叙事中写呜咽梗塞之情，絮絮如道家常，而文笔浩荡流转，感情凄切沉痛，在历代祭文中亦属杰作。

赠序是用来作为送别朋友时“临别赠言”的一种文体。一般的赠序，以述友谊、叙交游、道惜别为主，而韩愈的赠序，则大大扩展了这种文体的内容。在他的赠序中，除一般的叙友谊，道别情外，还阐述主张，议论时事，咏怀抱，劝德行，极大地充实了赠序文的思想内容，而且在写法上也灵活多变。他的许多思想性很强的名篇，就是用赠序体写成的。如他的《送孟东野序》，实际上就是一篇发挥自己文学见解的论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属愤世嫉俗的咏怀之作，是一篇批判社会现实的文字。

书信是常用的一种应用文，很早就成为我国古代文章中的重要文体。历代的作家文士，都很重视书信的写作。作为一代散文大师，韩愈在书信这种文体的创作上也有着非常高

的成就和自身独特的风格。韩愈的书信，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他的书信中，或议论时政，或讨论学术，或批评诗文，或传授学业，或抒写遭际，或劝谕亲朋，吐露真情，发表见解，往往发自肺腑，言之有物。他的书信，针对不同对象，因人陈词，一篇有一篇的结构和特色，措辞造语立意，极尽变化之能事，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其代表作有《答李翱书》、《与孟东野书》、《三上宰相书》等。

韩愈是一位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的散文大家。他的散文，在表现手法的创造和语言文字的锻炼上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大力提倡三代两汉之文，但却大量地吸收和提炼了当代的口语，丰富了自己的散文语言，并使之流利生动，明白易晓。他大力批判了六朝的骈体文，但却又适当地汲取了骈体文的整齐句法，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加上他文章中鲜明充实的思想内容，强烈丰富的感情色彩，使得他的散文具有一种包罗万象、雄健浑厚、气势磅礴和明快犀利、曲折自如的特点。宋代散文家苏洵评论韩愈的散文，说它“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内翰书》）这样的评价，是毫不为过的。

在唐代，和韩愈同时并且齐名的，是作为文学家的柳宗元。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和韩愈一起领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二人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后世并称“韩柳”。

和韩愈相比，柳宗元的散文，思想内容更加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的认识和批判，对下层民众的同情要比韩愈强烈得多。他主张“文以明道”，但却没有韩愈的儒家道统观念，只是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非常关心现实政治，对